



1840—1990

辽宁文学概述

辽宁省作家协会编

徐光荣撰·春风文艺出版社



序

金 河

这里呈献于读者的《1840——1990：辽宁文学概述》，乃为《辽宁省志·文化艺术志·文学篇》。

会当本篇以单行本付梓之际，承蒙不弃，嘱作弁言，自知本无龙睛之笔，谨略陈蠡管之见，以为引玉之砖。

每逢盛世，编志修史，千载如斯，已成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

古人有云：“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以当今的认识论观之，无论治天下还是治郡国，光以史志为鉴是不够的。为政者还应该认真研究本国本地区的现实状况，总结新鲜经验，同时也借鉴外国外地的经验，以便世易时移应之以新的招法。拘泥历史，固守成法，难免僵化，被动挨宰。

尽管如此，史志垂鑑于后世的作用仍然是不可低估的，因为历史往往有令人惊奇的相似之处。《易》曰：“君子多识前言

往行以蓄其德。”“蓄其德”，就是史学修养，就是以史为鉴，观古察今。既包括修身之准则，穷达之情致，进退之契机，忧乐之风范，也包括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节。由此可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各级政府领导的规模浩大的编志修史活动实为荫及子孙的恢宏壮举。此举又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结合起来，使编志修史的过程变为进一步认识本地区部门的历史和现实情势，认清潜力，考量短长，俾能增强信心，振奋精神，以展鸿鹄之志。

然而，此次编志修史又有不同以往的鲜明时代特征。言其要者，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还有内容的翔实与宏阔。

泱泱《二十五史》，浩浩历代方志，纭纭稗官杂记，文学家的著作和传记间或有之，但鲜亦寡；一个地区的文学发展史入志，却是史所未有，志所未见的。

鸦片战争以民族的尊严和自豪而始，却以民族的耻辱和羞愧而终。当战争的硝烟将将散尽之时，一位鲜为人知的辽阳籍诗人写出了诗作《感事八首》，直接反映了中华民族抗击西方强敌的伟业。他叫刘文麟，很受林则徐的器重，鸦片战争期间恰任职广东。但刘文麟也许没有意识到，他的诗揭开了辽宁地区近代文学史的扉页，并为这一历史时期的辽宁文学定下了苍凉悲壮的基调。

这一时期的辽宁文学虽有诸多散文、游记佳构，但突出成就却在诗和小说，而站在巅峰的又是一女一男两位少数民族作家。铁岭籍的满族女诗人顾太清，诗词俱佳，成就与纳兰性德并称，共作品在19世纪末已远播东瀛。另一位是北票籍的蒙古族大作家尹湛纳希。他用蒙古文写作的《一层楼》、《泣红亭》等长篇作品奠定了他蒙古族现实主义小说创作鼻祖的地位，并为中国多民族文学增添了光辉篇章。不过，中日甲午海战的壮歌、

圆明园的火光和日俄战争的枪声掩抑了尹湛纳希对封建家族兴衰和儿女沾巾的咏叹。金州曲氏一家老小 11 口不忍日军的蹂躏，投井自杀。金州同知的长诗《曲氏井题咏》用控诉和怒吼结束了近代辽宁文学史。

虽然早在 1917 年辽沈一些报刊就提倡白话文，并有一些白话诗文，但辽宁作家登上中国现代文坛较晚。然而在三十年代，辽宁作家创造了一个迷人的文学童话：他们较晚来到文学盛筵，却捧走了最令人垂涎的蛋糕。“九·一八”事变使东北变成了全国的东北，东北作家也以他们的勇敢、热诚、和才华成为全国作家。辽宁籍作家萧军、金剑啸、罗烽、白朗、端木蕻良、马加等，作品以雄浑、质朴、遒丽的笔致表现了东北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深重灾难和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促进民族抗日战争，功勋卓著，在中国文坛风光八面，领一代风骚。

在现代文学史即将结束的时候，随着解放大军长驱东北，解放区的许多著名作家齐聚辽宁。原辽宁籍的作家也回到即将开始新生活的故乡。群贤毕至，作家如云。本地与外地融合，塞北与江南沟通，昭示着辽宁当代文学一个更加璀璨夺目的明天。

纵观辽宁近现代文学前进踪迹，审视辽宁文学的积淀，我们当感戴前贤的厚泽，并充满超越的激情和信心。任何自叹弗如、悲天悯人、自暴自弃，都是失败者的情绪，不应属于辽宁作家。辽宁作家当气宇轩昂地大踏步跨进中国文学殿堂，有勇气去坐中间显赫位置：“托尔斯泰到了！”当然，雨果、狄更斯或乔伊斯、卡夫卡、马尔克斯、普鲁斯特也好。

本篇甫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下至 1990 年中国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成长的铿锵脚步令西方工业化强国骚动震惊，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已曙光初露，纵贯辽宁文学近代、现

代、当代这个历史时期，凡 150 年之久。述及近现代文学的全过程和当代辽宁文学不同的发展阶段，尤以浓彩重笔记述了新时期文学的空前繁荣。横向记述兼顾到文学的各个门类，以及文学社团组织、文学杂志报刊、文学思潮现象。文学与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的互动关系也给以举要提纲的记述，力求公正至当。

没有比创造更让作家孜孜以求、寤寐思服了。但是，不管写实的还是现代的，传统的还是先锋的，任何称为“创造”的作品，总从前人的遗产中找到它们似曾相识的东西来。自以为在披荆斩棘，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神情孤独、痛苦而豪迈。但低头仔细看来，那地上早就印有不少前人的足迹：中国的船形鞋、虎头鞋、红缨鞋、绣花鞋、青布云鞋、薄底快靴、粉底朝靴、古希腊的战靴、埃及人的沙地靴、英国绅士的皮鞋、美国牛仔的马靴，等等。这种事情近于捉弄，实在让创造者面色黯然，但这的确是事实。

今天文学是昨天文学的继承的发展，明天文学又是今天文学的演进和延伸。所谓“创造”云者，其优秀者也不过有别于他人——古人今人、中国人外国人——而已。而要有别于他人，只有了解他人，借鉴他人，包括本地区的文学遗存。

悠悠一个半世纪，仅以辽宁地区而言，作家亦众若广汉之星，作品多如恒河之沙。文学同行想追溯辽宁文学的历史履痕，借鉴传统以开创未来，即使有特异功能，倾毕生精力，欲求遍知恐怕也是很难的。本篇以区区 10 万字，为了解辽宁文学近、现、当代面貌提供了一个指南性简明读本。这确乎是文学同仁长期翘首以盼的。

不过本篇不可能出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殖民地和战争年代。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饿殍遍野，道殣相望，亡国亡家，颠

沛流离，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志士仁人或浴血于疆场，或呼号于国中，生存救国为头等大事，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编志修史不啻为一种奢侈。

新中国建立以后，战争结束，国家转入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心思安，社会稳定，按说是具备编志修史条件的，但是又偏偏中了极“左”幽灵的魔法，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斗争对象一场换一茬。自我折磨，自我折腾。“穷折腾，折腾穷。”文学被册封为“阶级斗争的晴雨表”，一直处于折腾的前沿，风刀雨箭，倍受创伤。比之树，则浇水施肥者寡，运金把斧者众；比之鸟，则喂食饮水者寡，举枪瞄准者众。直到演变成一场弃绝一切传统文化、包括革命传统文化的“文化大革命”，弄得共和国文苑百花凋零，篱空圃谢，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当此之时，当代作家或走死逃亡，或挂笔思过，大量作品或被定为“毒草”，或被打入冷宫自不必说，连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都不放过，历史已成为虚无，地方文学志又胡为乎来哉！

新时期以来，政治昌明，经济腾飞，思想活跃，百废俱兴。其势如东风化雨，青帝司时，一时间百花吐艳，魏紫姚黄，异彩纷呈，国色天香。从七十年末到跨入九十年代门槛，在这短短的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中国文学工作者长期蓄积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创造了罕见的辉煌。

辽宁文学与全国文学同步推进。从所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现代文学”到“新写实文学”，我们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对西方百余年文学实践成果进行了吸纳和演练，对数千年民族文学传统进行了发掘和弘扬。无论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作家的个人成就和群体实力、文学研究和理论评论、文学期刊和文学社团、文学普及和文学教学，都堪称历史最佳时期。

乱世兴兵，治世修史，不光为“急，先务也”，不光是个人力财力物力问题，更重要的恐怕是身居乱世，太史公们没话可说。在文学新时期十年之后为辽宁文学编志，站在一个光辉的起点上，叙述兴衰，评鹭得失，褒贬善恶，览察因果，才能有所依据，有所比较，有所鉴别，有所领悟。志史，本来就是成功者的记录。

然而，编志修史毕竟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

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即酝酿编写此篇，大家皆称善事。但是轮到实际运作，多为之却步。作为地方文学志，前人没有传下接力棒。因年代久远，有关史料大多湮没无存，有的散落于诸多稗史杂记和书稿文集之中，搜集起来形如大海捞针，其耗时费力之状是可以想见的。倘匆匆急就，偷工减料，必为“假冒伪劣”，不但贻笑大方，而且贻误后人。因此多年无觅肯花大功夫的折桂之手。

直到1991年夏天，议论才变成行动。作家徐光荣同志由辽宁美术出版社调到辽宁省作协工作，慨然承担起编写本篇的重任。这时作协才搭起专门班子，开始材料收集、整理和编写工作。光荣同志和编写组的其他同志以令人感动的热情和负责精神，不畏溽暑薰蒸，严寒侵袭，钻故纸堆，拜访省内外作家和学者，又多次向各路专家求教，终于积铢累寸，积腋成裘。又经过逾年的编写，删繁刈冗，去伪存真，才使本篇能同读者见面。本篇虽为集体劳动之成果，但光荣同志功在拓垦，应予志之。

本篇以单行本面世还在于继续征询有关专家和文学同行的意见，以厘正舛误，补充缺憾修改欠当，使本篇入志时更臻于精当。

1993年5月

目 录

序	金 河 (1)
综述	(1)
第一章 文学社团与机构	(13)
第一节 近代辽宁的文学社团与机构	(13)
第二节 现代辽宁的文学社团与机构	(15)
第三节 当代辽宁的文学社团与机构	(22)
第二章 文学活动	(29)
第一节 近代辽宁的文学活动	(29)
第二节 现代辽宁的文学活动	(31)
第三节 当代辽宁的文学活动	(39)
第三章 文学期刊	(51)
第一节 现代辽宁的文学期刊	(51)
一、辽宁早期的文学期刊	(51)

二、沦陷期辽宁的文学期刊	(55)
三、解放战争时期辽宁的文学期刊	(58)
第二节 当代辽宁的文学期刊	(61)
一、1949年10月——1966年6月辽宁的文学期刊	(61)
二、1966年7月——1976年10月辽宁的文学期刊	(63)
三、1976年10月以来的辽宁文学期刊	(63)
第四章 辽宁的诗歌	(68)
第一节 辽宁的古体诗词	(68)
第二节 辽宁的新诗	(78)
第三节 辽宁的散文诗	(91)
第五章 辽宁的小说	(93)
第一节 近代辽宁的小说	(93)
第二节 现代辽宁的小说	(96)
第三节 当代辽宁的小说	(104)
第六章 辽宁的散文	(118)
第一节 辽宁的散文	(118)
第二节 辽宁的报告文学	(129)
第三节 辽宁的杂文	(136)
第七章 辽宁的文艺理论与批评	(140)
第一节 近代辽宁的文艺理论与批评	(140)
第二节 现代辽宁的文艺理论与批评	(142)
第三节 当代辽宁的文艺理论与批评	(145)
附：《辽宁文学概述》参考书要目	(153)
后记	(158)

综 述

自 1840 年迄今的辽宁文学，对辽宁近代、现代、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与影响，在中国文学史册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辽宁是个历史久远，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汉族、满族、蒙古族、锡伯族、朝鲜族等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岁月里，在经济、文化发展的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辽宁文化艺术，辽宁的文学以反映关东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和斗争，在形式、艺术色彩等方面的浓重、突出的地方风格而令人瞩目。

自顺治七年（1650 年）函可在沈阳组织“冰天社”，首开东北文人结社之先河，辽宁地区的诗文创作渐趋发展。1840 年以后，辽宁文人以沈阳、辽阳、铁岭等地为中心，结成许多诗社，先后出版诗文集二百余部。辽阳籍诗人刘文麟在鸦片战争期间，受林则徐器重，恰在广东任职，他的《感事》八首，是我国最

早直接反映这场战争的诗歌杰作之一。铁岭籍人郑文焯，足迹自辽北而陕甘、吴越，究愁潦倒中以诗鸣，写出大量诗词，删定《樵风乐府》十卷，在词史上与王鹏运、况周颐、朱孝臧被并称为“清季四大词人”。铁岭籍满族女诗人顾太清，诗词俱佳，其《东海渔歌》、《天游阁诗》，19世纪末即传到日本，被称为满族两位重要诗人之一，“论满州词人，有男中成容若（纳兰性德），女中太清春之语”。其他如沈阳的缪公恩，铁岭的魏燮均，锦州的金朝觐等，都以诗著。光绪末年辽阳的房毓琛，沈阳的刘春煊、荣文达，被称为辽东三才子，他们的合集《辽东三家集》，影响颇广。

小说与散文创作，这一时期也颇见成果。如果说辽阳佟世思的《耳书》是清代辽宁较早出现的短篇小说集，曹雪芹、高鄂的《红楼梦》曾为辽宁地区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闪光的一页，那么，这一时期，北票籍的尹湛纳希则被认为是蒙古族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鼻祖，他用蒙古文创作《一层楼》、《泣红亭》等四部长篇。其《青史演义》是叙述蒙古族历史的史诗性长篇。尹湛纳希多才多艺，创作丰富，他的作品不仅是中华民族文艺宝库中的瑰宝，而且被译成日、俄、法文在国外流传。这时期的散文，多见于文人集钞之中，锦州金科豫从仕四川期间，写出《解脱纪行录》，“浩浩三千余言”，“有字锤句炼处，有典雅工致处，有曲折峭拔处，有苍凉悲壮处，有珠玑错落处，有浑灏浏转处”，被认为是记游名篇。铁岭籍张德明八次旅欧所著《海上述奇》等八本游记，是中国近代散文佳品。

鸦片战争以后的辽宁，由于北方俄罗斯入侵，东方日本的进逼，以及日俄两强在东北土地上的争斗与瓜分，使辽宁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愈到清末时愈明显。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

中国，再次震动了中华民族，也催使辽宁有识之士猛醒。金州海防同知王志修在甲午之战后写出的长诗《曲氏并题咏》，是悲惨的控诉，是愤怒的吼声。海城籍赵中鹄以潘志仁投海殉国事迹，编写了剧本《唤同胞》，也是辽宁近代较早以文学张扬爱国主义，唤醒民众觉悟的作品。而张之汉、王永江的许多诗作，以忧国忧民之情，广得传诵。

辽宁的新文化运动略晚于全国的新文化运动。虽然早在1917年，辽沈一些报刊就开始提倡白话文，也散见一些白话文学作品。而真正的发端则在“五四”运动之后，蓬勃发展于二十年代末期到“九·一八”事变前后。“五·四”以后，关内一些进步刊物、进步文学作品的传入，对东北文学起到了启蒙作用，辽沈地区的一些知识份子如吴竹村、王卓然、梅佛光等开始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大力倡导新文化运动。而亲身参加了“五·四”运动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杨晦、任国桢等先后回到辽宁，都给这个运动注入新的活力。杨晦在这一阶段创作了《谁的罪》等九个批判农村传统封建意识的剧本，任国桢翻译的《苏俄文艺论战》由鲁迅先生作序出版，是我国较早介绍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译作之一。这一时期沈阳、大连的《盛京时报》、《新文化》等都开始发表白话小说、诗歌等，《盛京时报》编辑穆儒丐1919年发表的《香粉夜叉》，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他的一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生与现实，当时颇有影响。其他如梅漪的短篇小说《幻想》，金小天的长篇小说《鸾凤离魂录》，吴裔伯的长篇小说《父母的心》等，都以现实生活为题材，或表现对现实社会的憎恶，或对封建礼教愤懑、对科学理想的追求，为“万马齐喑”的社会氛围添了一股生气。

专门性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期刊在这个时期不断涌现。沈阳

市出现启明学会，文学研究会，出版了《启明旬刊》、《奉天学生》杂志，宣传新思想、提倡新文学。大连出现大连中华青年会，创办《新文化》（后改为《青年翼》），开辟了新文学创作专栏，影响所及遍至东三省与关内各大城市。

“五·卅”运动以后，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在文化领域斗争的日益深入，各种文艺团体在辽宁文坛上与日俱增。比较有影响的关外社、木铎社、白杨社、北国社等，先后创办了新文学刊物《关外》、《冰花》、《北国》等，发表理论文章，宣传倡导无产阶级文学，并发表了许多反映早期人民革命斗争的小说、诗歌作品。

这个时期最能反映辽宁新文学创作实绩的一个特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影响下，一些进步作家初步运用革命现实主义的方法写出了一批表现革命现实斗争的作品。张维舟的新诗《悼林祥谦》、《示威》，宗爱光的散文诗《怎吗死底？》，天恨的短篇小说《烈士的妻子》等，真实地反映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五·卅”反帝爱国群众运动这样震惊中外的伟大壮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册上留下闪光的一页。其次，一批辽宁青年作家带着散发浓郁关东乡土气息的新文学作品，从此踏上中国文坛，并出现许多作家作品专集。马加、周东郊、郭维城等都在这个时期开始了创作活动，而宋树人的创作集《樱花第一枝》等，已引起人们的注意。

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后，祖国辽宁大好河山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在这里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殖民统治。在此期间，他们大搞殖民地思想文化统治、实行“官制文化”，炮制“艺文指导纲要”，设立伪“满洲艺文联盟”，凶残地镇压抗日爱国文学，扶植卖国投降的

汉奸文学，使这一时期辽宁的报刊上出现了粉饰、美化日伪傀儡政权，无耻吹捧日本法西斯强盗的汉奸文学作品，带有明显的殖民地文学特点。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和十四年的敌伪统治，使正在发展的辽宁地区新文学遭受严重摧残。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的推动下，辽宁地区的革命进步文学在艰难的条件下仍得发展，辽宁籍作家罗烽、金剑啸、萧军、白朗等，在党的领导下，较早地走向革命文学道路。金剑啸的长诗《兴安岭的风雪》是揭露日伪黑暗统治、激励人民起来斗争的杰出诗篇。较晚出现的满族作家田赉的诗歌小说也崭露出斗争的锋芒。一批辽宁籍的共产党人、抗日联军将士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武装斗争中，留下许多催人泣下，促人奋起的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

在日伪统治下的进步文学是在沦陷区的险恶环境中曲折地发展的。沈阳籍作家袁犀在这个时期中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泥沼》。主张“乡土文学”的山丁和秋萤等，都埋头苦干地写出许多作品。

三十年代出现在中国文坛的东北作家群，以自己的创作紧密配合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为现代文学宝库增添了一份值得珍惜的财富。这个作家群中许多成员曾经是东北地区革命文学的奠基人，后来，他们流亡关内，以影响更广泛的作品，为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东北作家群中，萧军、罗烽、白朗、端木蕻良、马加以及金肇野、李满红、雷加、蔡天心等都是辽宁人，他们的作品以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为代表，继之则有端木蕻良的《鸳鸯湖的忧郁》、罗烽的《第七个坑》，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等著名短篇，以及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马加的《寒夜火种》等中长篇问世，他们的

作品表现东北人民的苦难与斗争，对唤醒中华民族的觉醒、促进抗日斗争的发展起着震聋发聩的作用。

从1945年“九·三”胜利，到1949年“十·一”新中国诞生，是中国社会发生天翻地复巨大变化和历史转折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东北人民进行伟大的解放战争和土地革命的同时，也注重文化战线的斗争。从陕甘宁边区和延安抽调大批优秀文化干部到东北解放区，开展文化教育工作，繁荣文艺创作。其中凯丰、刘芝明、舒群、谢挺宇、井岩盾、刘白羽、华山、吴伯箫、公木、安波、申蔚、安危、方冰、胡零、江帆、师田手、崔璇等先后来到辽宁，原辽宁籍的作家萧军、罗烽、白朗、雷加、马加、蔡天心等也先后返回，他们积极贯彻党的文艺路线，肃清日伪法西斯文化和汉奸文学的流毒和影响，使东北文学迅速得到振兴，跟上了时代的要求。

这一时期，《东北日报》开办了文艺副刊，《东北文学》、《白山》、《星火》、《鸭绿江》等文艺期刊雨后春笋般涌现，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是1948年11月沈阳解放，东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移至辽宁，解放区的许多著名作家云集沈阳，反映辽沈战役的报告文学在火光中问世，描写东北土改，描写工业战线的第一批作品也相继呱呱坠地。刘白羽的报告文学集《环行东北》，华山的报告文学集《踏破辽河千里雪》，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马加的《江山村十日》，草明的《原动力》就是其中的代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辽宁是东北局所在地，东北文学工作学协会在沈阳成立。1953年，东北文学工作者协会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沈阳分会是中国作家协会八大分会之一，分管东北三省的文学创作和事业。这种局面一直到1956年，长春和哈尔滨分会成立为止。这是五十年代初期，一

方面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在展开，在另一方面，经济恢复建设也在紧张进行，作为东北文化中心的辽宁既是战争的直接后方，又是经济建设的先锋战地。促使辽宁文学在建国初期，就出现一个繁荣时期，而在全国占有突出地位。

草明继《原动力》之后，写出长篇小说《火车头》。白朗完成了中篇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成为当时青年喜爱的作品之一。马加在写出充满草原气息的中篇《开不败的花朵》之后，又完成了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长篇小说《在祖国的东方》。韶华深入前线写出了描述志愿军战斗生活的《燃烧的土地》。罗丹出版了《飞狐口》，谢挺宇写出了《验收员》。郭墟写出了新中国第一部获全国儿童文学奖的儿童小说《杨司令的少先队》。诗歌方面则有井岩盾的《摘星集》，方冰的《战斗的乡村》。话剧方面，胡零写出了《前进再前进》，木柯夫继《堤》之后，写出了《双婚记》。而孙芋的独幕剧《妇女代表》、崔德志的独幕剧《刘莲英》，位居全国独幕剧之首，演遍九州。

这个时期，不仅专业作家收获丰富，而且一批青年业余作者也从生活深处涌现出来。杨大群、李云德、徐光夫，潘洪禹等人就在那个时期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杨大群的儿童中篇《小矿工》在当时产生了全国影响。

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前后，我国的政治生活开始阴晴无定，不太正常，辽宁的文学也在动荡不安中发展。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打掉了一批有才华的青年作家，郭墟就是其中的代表。有些在日伪时期写过一些有价值作品的作家受到不公平待遇。但是辽宁的文学创作仍是在向前发展的，一些老作家深入生活，写出了新作，一些有才华的青年作家成长起来。草明写出了反映鞍钢生产斗争沸腾生活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罗丹写出描绘鞍钢恢复时期的力作《风雨的黎明》，这部力作曾被

茅盾誉为“气宇轩昂，文气浩荡”。马加写出了标志自己创作新水平的《红色的果实》，韶华深入水利建设工地，写出了中篇《浪涛滚滚》，成为韶华创作中的新阶段，得到了茅盾批阅和全国好评。北票籍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重新修改出版了《在茫茫的草原》。于敏写出了反映普通劳动者的长篇报告文学《老孟泰的故事》、《王秀兰和姐妹们》，拥有广泛读者。安波的《雷锋颂》，方冰的《飞》，都是有影响的诗作。思基的《过渡集》则是代表我省文艺批评水平的理论著作。这个期辽宁文学的重大进展是有一批文学创作骨干在跃上文坛后显示了实力。霍满生、刘文玉、陈琦、吴梦起、胡景芳、朱赞平、李惠文、晓凡、刘镇等就是其中的代表，霍满生的《铁牛传》，是引起全国瞩目的长篇叙事诗，晓凡的诗《车间风雷》，刘镇的诗《满天飞霞》，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开了一时的诗风。朱赞平、晓凡等的长篇报告文学《红心壮志》，曾得到已故著名科学家华罗庚的称赞，挥笔著文推荐。吴梦起、胡景芳的儿童文学也有全国影响，陈琦的小说《出路》、李惠文的小说《三人下棋》都在读者中引起不小的反响。

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下达，辽宁文学毫无例外的贯彻，辽宁作家集中整风，蔡天心的长篇小说《大地的青春》挨批，紧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辽宁文学和全国一样，在十年劫难中备受摧残。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九七六年以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光照下，备受摧残的辽宁文学重新复苏，并跨进一个崭新阶段，在这个阶段辽宁文学创作与文学事业呈现出空前活跃、空前发展的态势。

随着思想解放，辽宁的文学期刊和发表文学作品报刊与日俱增，以《鸭绿江》和各市地主办的《芒种》、《海燕》等文学